



CHINA DEVELOPMENT BRIEF

中国发展简报

北京公曼汇咨询中心 编

www.cdb.org.cn

第52卷



书

● 专题

“丑闻年”：谁的狂欢

组织公益：黯然失色在个人公益的光影下

● 观察

全球基金之变：中国艾滋病非政府组织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

女性感染者的声音：山女晋娃走进平遥国际摄影大展

● 研究

云南国际NGO管理政策的演变

● 域外

占领华尔街与当前美国社会运动的新形势



D632-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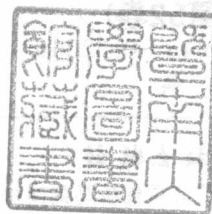
20101

52

2011年 冬 No. 52
www.cdb.org.cn

中国发展简报

北京公曼汇咨询中心 编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内容提要

《中国发展简报》由北京公旻汇咨询中心编写，结合其网站（www.cdb.org.cn）为NGO的行动者和关注NGO的公众提供实时的有关发展问题的资讯、报道，刊载NGO自身发布的信息，并发布相关咨询意见和研究成果。北京公旻汇咨询中心还有选择地参与某些领域NGO的倡导行动，希望这些行动有助于改善NGO的总体生存空间和法律环境。

读者对象：社会发展及NGO领域工作者，社会公众。

责任编辑：龙 文

文字编辑：盛 燕

装帧设计：上海小笼包聋人协力事务所

责任出版：卢运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发展简报. 第52卷 / 北京公旻汇咨询中心编.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1

ISBN 978-7-5130-1044-3

I. ①中… II. ①北… III. ①社会工作—中国—丛刊 IV. ①D63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80973号

中国发展简报(第52卷)

Zhongguo Fazhan Jianbao (Di 52 Juan)

北京公旻汇咨询中心 编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桥马甸南村1号院

邮 编：100088

网 址：<http://www.ipph.cn>

邮 箱：hjb@cnipr.com

发行电话：010-82000860转8101 / 8102

传 真：010-82005070 / 82000893

责编电话：010-82000887 82000860转8123

责编邮箱：longwen@cnipr.com

印 刷：北京富生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5

版 次：2012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字 数：160千字

定 价：16.00 元

ISBN 978-7-5130-1044-3/D · 1396 (3922)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本书获福特基金会和全球绿色资助基金会资助

主 编：付 涛

主任编辑：刘海英

编 辑：李思闽

责任编辑：李思闽

网站编辑：郭 婷

行政支持：张耿瑞 闫慧颖

北京公旻汇咨询中心

电话：+8610-6407 1400, 8402 5759, 8402 2532

传真：+8610-6401 7737

电邮：office@cdb.org.cn

地址：北京东城区北河沿大街嵩祝院北巷钟鼓胡同15号

邮编：100009

网址：www.cdb.org.cn

谛听熙攘中的民间声音

——2011年公益回眸

2011年又近尾声。这一年国际社会以革命、运动或者骚乱之名出现的事件应接不暇，颇有末世熙攘的意味，和这些乱局相连的是自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由欧洲的债务危机导致的政治危机，纷呈复杂，不一而足。中国从不缺少新闻和大事，今年又是政治年前期，但两个小女孩足可以成为中国2011年的封面人物。7月23日温州动车相撞事故，一个名叫小依依的2岁女孩幸运生还。作为一个在国际上越来越有发言权的发展中国家，高铁同时也被视为中国必须把握的战略关键环节。而9月广东的小悦悦被2辆车先后碾过，18个路人视而不见。尽管冷漠、欺诈似乎已经成为中国的常态，但是小悦悦之死还是触动了中国人已经麻木的神经。

在这一片衰色之中，公民社会却呈现了良性成长的兆头。即使是“丑闻”迭出，都不过是最近几年公益主流化的延续，因为互联网，尤其是微博等新媒体的助力，公民个人的公益行动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阶段性成果，成为组织公益之外的另一种尝试。在社会管理创新的话语之下，民间组织的生存空间和合法性已经出现令人欣喜的变化；公益领域集体喊出了“不要血汗公益，要加薪”的呼吁，这种自我表达也将成为制度变革的前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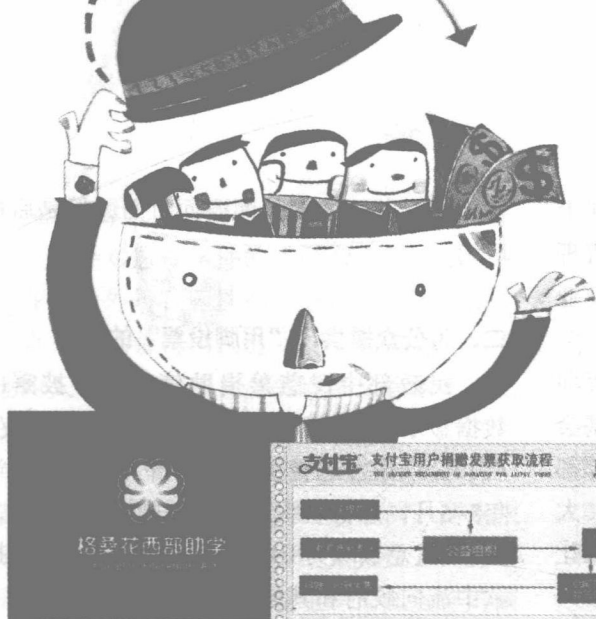
中国公民社会发展是嵌入到中国的现实之中的。在艾滋病防治领域，因为国际金融危机和草根组织参与性少等问题而导致全球基金一度中断；民间公益组织大多还不会在主流的频道上发声或者不能发声；除了快乐公益，人人可以微公益，这个领域依然存在苦难和牺牲。除了中产阶

层和知识精英在不影响个人生活品质之下奉献的善意，这个社会仍然需要秉承理想、负重前行的NGO伙伴们。

过去的一年，公众通过媒体再造的公益领域镜像和真实的世界有了差距，作为业内的交流平台和NGO媒体，在年末回顾之时，《中国发展简报》希望能尽力传达一些被遮蔽和被淹没的声音。由此，这个专题除了撷取今年公益领域的几个重要的变化，我们特将行业内一些通讯、期刊信息辑录出来，是为“声音”。

目录

专题	“丑闻年”：谁的狂欢	1
	“血汗公益” 曝出制度变革前声	5
	组织公益：黯然失色在个人公益的光影下	8
	社会管理创新话语下的新空间	11
	声音：民间出版物集粹	15
时讯	残障人士拥有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	20
	USDO发布财务信息披露报表模板	22
观察	全球基金之变：中国艾滋病非政府组织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	23
	打工子女教育政策变动不定，NGO如何应对	27
	女性感染者的声音：山女晋娃走进平遥国际摄影大展	30
	信息公开诉求为何被拒之门外	34
影像	《美丽的行走》观摩手记	36
专栏	管理费的话语变迁	42
研究	云南国际NGO管理政策的演变	45
	财务管理水平整体提高 组织之间分化加剧	54
域外	占领华尔街与当前美国社会运动的新形势	58
	Ashoka关于社会创新变革的理念和做法	65
实践	企业的心思我不懂 CSR经理给NGO支招	68
机构	互联网中诞生的NGO：青翼社会工作人才服务中心	70
	爱心时间银行：让爱心具有交换价值	71
工具	亚洲促进会《非营利组织生存指南（2011）》	73
	让孩子远离家庭暴力——《反儿童暴力宣传册》	74



“丑闻年”：谁的狂欢

◎ 刘海英

2011年很快就过去了，少不了回望这一年公益领域的林林总总，出挑在眼前的是一串的“丑闻”事件，称这一年成为公益领域的“丑闻年”并不为过。今年被媒体以“揭丑”为内容的报道，不是一个个独立发生的丑闻的碰巧扎堆，而是历史的积累在一个偶然的时点上的集中爆发。在一个个丑闻爆料、公众关注的狂欢中，身在其中的NGO可以趁着每次外界的推动，促进行业的发展。一个个爆料尘埃落定的年末，媒体和网民的喜新厌旧病开始发作，狂欢之后，各回各家，留下的持久的制度建设工作，谁来接盘？

件”将红十字会信任危机推向近几年来的最高峰。如果说之前的万元帐篷和餐费是一个如何使用善款的问题，后面的红商会与公司的勾连，在性质上则不可同日而语。一些业内人士认为，红会下属分会及基金会过度涉足商业运作，既违反了红十字标识和知识产权不能被用于商业营利的基本原则，也为打着公益慈善旗号谋私利的人开辟了打擦边球的空间。利用红十字标识和名义，开展商业营利活动，这是红十字会商业化经营的合法性和边界问题，“郭美美事件”背后的逻辑再熟悉不过，以公益的名义谋取利益，或以其他名义谋求利润，炫丽的外表下，总是能发现“丑闻”。

河南宋庆龄基金会一再成为媒体关注的对象。先是基金会放贷，捐款付息浮出水面，投资房地产、钢铁、计算机网络、商品贸易等诸多领域；另外河南宋基会以“公益医保”名义在农村大量“吸金”。后又被曝出在郑州黄金地段建设一座大型“宋庆龄”雕像，带出了这个公益机构“自筹资金”4亿元建设的大型项目。这么张扬旗鼓地在城市投资放贷搞房地产，哪里是一个慈善组织，

一、“丑闻”回放

“丑闻”爆发引发的各种讨论和情绪发泄，是公众对于行政部门垄断和长期不透明的信任危机质疑的出口，今年最大的几起丑闻都与公募基金会有关。

“丑闻”影响最大的当属红十字会。始发于2011年6月的“郭美美炫富”，2008年四川地震救灾中被爆出万元帐篷，今年上海卢湾区红十字会的万元餐费，这些连续出现的丑闻引发了高涨的公众质疑，而“郭美美事

分明是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12月1日在上海慈善会论坛上，中国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孙伟林说：“个别基金会热衷于商业运作、甚至出现了营利倾向。”

被冠之以卢美美事件的中非希望工程项目扯出了世界杰出华商协会，连中国青基会也被牵扯进来。会议经济、企业家俱乐部都是一种现实的商业经营，同样的问题是，大量的商业经营挂上了慈善的“羊头”，就让普罗大众愤怒了。11月27日，CCTV在网络声音渐渐消停之后，再曝曝出海外注册社团在大陆躲避监管而吸金的案例。

作为中国第二大公益组织的中华慈善总会也没有被人遗忘。中华慈善总会给一家太阳能电池板公司开出价值1 500万元捐赠品的发票，但该公司实际上并未捐赠。该会为此收取5万元手续费。按照现有的法规，慈善机构开具捐赠发票，捐赠者可享受减税待遇。央视报道称，捐赠者持1 500万元发票，可以减免200万元税款。而这个开具捐赠发票的资格，只有少数慈善组织可以享受。利用这些稀缺的公权力谋机构收入而致国家税收流失，为逐利而越界的面目一次次呈现在世人面前。

在这几股强大的舆论质疑中，还有一些事件充当了丑闻年的“配角”。其中有对陈光标捐赠项目掺水、在家乡假慈善、真商业的质疑；廖冰兄基金会自曝财务丑闻，主动公布一桩“家丑”：该基金会出纳利用职务之便，采取虚构资金用途及做假账的方式，侵吞基金会善款近80万元。而8月民间网络组织格桑花被指财务管理疏漏、会员造假等，对草根组织也是一个不小的震动。而多年前，青基会创办人徐永光和南方周末记者方进玉报道的青基会投资的一桩公案，再次

被提起，甚至一度传闻要面对面，但是后被取消。

二、为公众提供了“用脚投票”的范本

民政部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披露的数据显示，2011年6月“郭美美事件”发生后，公众通过慈善组织的捐赠大幅降低。当年3~5月，慈善组织接收捐赠总额62.6亿元，而6~8月总额降为8.4亿元，降幅86.6%。但捐款中流向政府和其他部门的总额并未降低。民政部官员曾说，再穷追猛打“郭美美事件”会伤害慈善事业。[●]一个小插曲是，主流媒体对官办NGO的评论，导致某些组织的捐款数量下降，但对草根NGO筹款影响不大。

7月7日，中国红十字会向社会承诺，要做到“两公开两透明”；即捐赠款物公开，财务管理透明，招标采购公开，分配使用透明。7月15日，民政部发布了《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后又发布了《公益慈善捐助信息披露指引（征求意见稿）》，承诺下一步还将陆续出台相关法规。民政部已代国务院起草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速慈善事业发展的意见》。下一步还将专门出台《企业参与慈善事业规范指南》。

早在2011年3月，中国扶贫基金会首先晒账单，在7月郭美美事件刚刚发生后，基金会中心网在成立一周年之际召开的“透明公益给力和谐社会”会议上，将透明和公信力作为主题，倡议基金会“晒行动”。

10月30日是壹基金发起的NGO自律联盟（又称“自律吧”，USDO）成立两周年的纪念日，其成员多为草根组织。两年来，已有67家公益组织成为成员。“自律吧”在11月18日发布了财务透明模板，推动公益组织财务信息公开。在公益领域问题不断的时期，

● 北京晚报.慈善组织接捐赠额骤减 [EB/OL].[2011-08-26]. 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1_08/26/8709777_0.shtml.

民间组织拿起了自律修炼的武器。

社会对这些事件的质疑和责问，不论是专业还是外行，理性还是不理性，无不指向“官办”慈善机构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只有业内人士，南都基金会副理事长徐永光道出了这几个事件“涉及的麻烦和背景、原因、性质各不相同”。他认为：“郭美美事件”属于商业红会公益创新的失败案例，河南宋基会的“公益医保”属于决策错位，而这些事件引发了我们对“公益组织商业运作的规则和底线”问题的探讨。徐永光表达了对“官办”慈善机构的不信任，认为官民不分的慈善体制是导致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这些业内视角的观点，在社会公众的讨论中完全被虚化了。

公益组织发育有其独特的规律和方向，可持续发展不可能零成本运作，少不了和商业沾边。投资、创新公益等形式一直要做下去，那么底线和边界在什么地方？面对这样的社会大讨论，公益组织何不借此机会，对公益组织的真实环境和运作规律进行一次大众普及，去影响媒体和公众，避免笼统地言说透明和垄断等简单的结论？这样不但有利于为公益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创造好的环境，避免网络暴力的误伤，也能增加公众对公益事业甄别能力。

三、质疑的力量

被我们冠之以“丑闻年”的2011年，其实显示公益议题被媒体主流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从2010年被媒体热炒的几个事件就开始了。

2010年9月李连杰接受央视“面对面”采访时称壹基金与中国红十字会的合作可能会中断，且问题“意想不到的严重”，这一事件一时成为各大媒体关注热点。9月29日，世界顶级富翁沃伦·巴菲特与比尔·盖茨来到北京邀请50位中国富豪参加“慈善晚宴”；

7月7日，民政部会同五部委发布《青海玉树地震抗震救灾捐赠资金管理使用实施办法》，引发了十多家全国性慈善基金会的困惑、担忧，乃至态度明确的反对。

中国公益领域已经成长出可以质疑的力量，尤其是非公募基金会，在数量上和自我意识的觉醒上已成为对抗行政垄断的力量。2008年以来，四川地震，民间资源迅速聚集，使得基金会展开了增量资源的争夺。救灾中的公募资格从最初的3家增至15家。公募基金会已经出现了不同的面貌，而非公募基金会的迅速发育，使得传统老基金会面临更大的挑战。

汶川震后3年多来，慈善和公益多多少少已经成为街谈巷议的谈资，而新媒体，微博凭强大的聚集和放大声音的功能，抖落出一个又一个的丑闻。微博成为生长中的新“社会权力”宠儿，学者康晓光将汹涌的公众表达称为“一个舆论时代已真正到来”。而传统媒体继续跟进和深入的报道，使得公众对于网络新闻和传统媒体产生的微妙的信任和怀疑，因两种媒体的互证而消解。至此，公益界的公共事务，见证了“用脚投票”的案例。

四、格桑花的案例中的多种声音

在2011年的丑闻中，格桑花的案例可能是唯一备受争议的，争议不是来自社会大众，而是民间组织内部。

《公益时报》发表文章“格桑花被指会员名单造假 财务混乱陷发展困境”，以《社团登记管理条例》为标准提问：“地方社团能否大量招募外地会员？会员能不能不缴会费？因为会员入会的地域限制而编造虚假会员信息获取登记注册的社团该不该取缔？”

文章指出格桑花在财务、管理等方面出现的问题，如“财务账目混乱，管理机关是不是能够容忍？年度报告可不可以不反映实

际情况？面对在网络等虚拟空间生存的社会组织，有关部门该如何监管？”

和对“郭美美事件”等事件的群体沉默相比，民间组织在灰色环境中生存，被迫接受一些不合适的法规，甚至不得不“非法性”生存，这是一种普遍的状态。对格桑花财务混乱现象、对会员制组织的管理问题，独立媒体人、女声报编辑吕频认为，一个新注册的NGO，没有全职工作人员，靠会计远程记账，录入错误为什么不能原谅？《公益时报》的报道没有指出任何贪污、挪用、滥用行为，公众真正关心的是善款善用。政府机关本身在财务廉洁公开方面就没有做出表率，（这点反而）应该向NGO学习。

NGOCN论坛有帖子指出，媒体应该“拥有建设性的心态和全局眼光”，但稍微了解公益行业的人就会知道报道中提到格桑花的各种问题，如合法身份、两张皮、会员等等是诸多民间公益组织共同面临的问题，也是促进民间公益发展需要着力去解决的。如果媒体能够有建设和发展公益行业的态度和眼光，去触及民间公益组织的法律法规和管理上的问题，不是将更有意义吗？8月23日，格桑花在官网上发布了“对大家关心的几个问题的说明”一文，针对《公益时报》指出的问题，对公众做出解释和说明。●

9月，格桑花负责人洪涛在其微博上写道：“在未来希望公益界的伙伴们有人来写中国草根公益组织发展史，写我们草根组织的生命力，写我们的挫折痛苦和头破血流，写我们的纠结和无奈，写我们如何绞尽脑汁，写我们如何在夹缝中生存，写我们的血泪故事。站在未来看今天。”基于对夹缝生存、非法生存的同情和相惜，也是对共同身处的外部环境的无奈，业内引发了对格桑花的支持和同情。

圈里流传的民间组织“丑闻”已经不少。如果民间组织没有危机意识，不主动发声去正本清源，任由对公益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和认识蔓延、放大，或许将集体成为某个“丑闻年”的主角，引发对行业的影响将不再是公众用脚投票的问题，也许就会成为压在脆弱的生存环境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9月有媒体报道，南都公益基金会出资10万元支持格桑花请专业第三方机构对机构进行评估。12月18日，“青海格桑花教育救助会发展研讨会”在京举行。研讨会上，第三方独立评估机构瑞森德正式发布了《青海格桑花教育救助会组织评估报告》。报告对格桑花的组织身份合规性和风险性、信息披露现状及披露机制、重大行政管理支出、组织治理结构和志愿者管理等5个方面进行了评估。针对此前《公益时报》文章提出的财务管理、10万元人力咨询服务采购交易等问题，一一给出了答案。评估报告不久将在相关网页发布。会上，与会者对格桑花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建议。

重大事件的发生、讨论、调查甚至诉诸法律，都可能成为推动制度建设的契机。但至今还没有第三方对今年涉及几家公募基金会的事件做出独立的评估，而业内对格桑花事件发出的不同声音、南都基金会的资金支持、瑞森德的评估，构成了格桑花事件处理的一个难得的案例，也会是一个重要的标志。

总之，今年连串的“丑闻”加剧了公益组织的信任危机，将多种问题大杂烩后，共同指向透明和公开，以及对资源垄断的批判。目前，这种强大的社会批判基本上还是停留在舆论的阶段，对丑闻暴露出的问题具体是什么，怎么解决，需要下一步更深入讨论。

● 北京晚报. 慈善组织接捐赠额骤减 [EB/OL]. [2011-08-26]. 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1_08/26/8709777_0.shtml

“血汗公益” 嘹出制度变革的前声

◎ 刘海英

11月8日，NGO同行们互相打听：今天有停工的吗？

原来在10月11日，网名“威风老虎”的公益人徐振军在NGO发展交流网上发出“反对低薪：停工一天”的呼吁，由此，他有了“公益加薪哥”的名头。

“公益加薪哥”向公益伙伴们倡议，在11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停工一天。他建议：

1.我们不是要罢工，不用具体针对自己的机构或资助者；

2.最好是整个机构一起来参与，以免让个人陷入尴尬的境地；

3.我们的目的是让公众，至少是关心公益事业的公众对我们有更多的理解；

4.我们将在微博上召唤公益伙伴，一起来说出你最想的4个“要”！

不管你是要生存、要保障、要加薪、要升职、要恋爱、要结婚、要娱乐、要休息、要学习、要发展……

随即在停工日后的11月10日，在NGO发展交流网上，出现了一家国际机构的员工给机构负责人写的公开信。信中提到工作待遇问题、变相扣工资和占用休息时间的问題：“和我的工作所承担职责、风险与压力相比，我没有得到合理的待遇，目前的待遇也落后于社会其他行业的发展，加上长期出现的拖欠工资、未按劳动合同约定每年及时的兑现工资增长、未按国家及云南相关规定要求购买住房公积金等问题，使我倍感生活

压力很大；占用员工休息时间工作是需要有补偿假或者补偿金的，除非有紧急的事情，今后我拒绝在周末、节假日工作”。这封公开信将持续半年的公益人热议的薪酬问题一直延续到年尾。

除了NGO发展交流网，今年下半年几家业界媒体频频发力，直指公益领域的薪酬和人才问题。这样集中火力强攻一个问题，在业界还算少见。《中国财富》是今年7月才改版的杂志，9月号的“血汗公益”专题，因略带噱头意味的“血汗”二字，将这个常谈的问题增加不少麻辣感；《社会创业家》今年第7期“我的公益‘薪’”，除了发表业界同仁感受和故事，还透露出了一些不同类型组织的薪酬标准。《中国发展简报》的网站是业界招聘信息发布的重要平台，利用得天独厚的优势，简报将去年的信息做了翔实的数据分析，并针对薪酬和人才培养问题举办了小型研讨会，后以专题形式刊发在今年的秋季刊上。

宣告：提升人员成本的时候到了

2010年底，数家基金会联合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调研公布了《中国公益人才发展现状及需求调研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公益行业NGO从业者的薪资收入在5 000元以下的约占90%，2 000~3 000元段最为集中，占25.7%，无固定收入和月薪资在1000元以下的占到18.4%；20%以上的人平均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

公益领域的薪酬低是一个多年的现象，尤其是由于草根组织低薪资普遍存在，长久以来甚至被社会认为是理所当然。在网上的评论和跟帖中，经常可以看到的观点是，你愿意奉献爱心你就来，何必谈工资。甚至很多人以为这是退休的人发挥余热的地方。更有无知的媒体，津津乐道所谓零成本的行政费用，对行业的可持续发展真是一大损害。近几年公益虽然闹得红红火火，但公益人却被社会边缘或者自我边缘。

资助方是公益链条上举足轻重的角色。但资助方多把资金主要用于项目的开展和执行，人力资源的投入低，在过去的组织发展中，有限的资源往往集中在机构负责人和发起人身上，尤其是年轻人缺少持续发展的机会，这也是导致机构发展多年，而成长起来的只是那几个负责人的原因之一。

今年大家以各自的形式发出自己的声音，正式宣告：该是到了正视草根组织公益人生存和职业发展问题的时候了！业界呼吁：各类资助方的认知和导向有必要形成共识，从项目费用中人员成本的结构和比例改善开始吧。

这个现象持续了这么多年，业界也呼吁了很多年，为什么在这几年才开启了改变的进程？这和近几年公益领域不同群体的进入和行业构成发生变化有关。大家近距离看到，有的基金会员工年薪10万，但是草根组织的人员成本却低得可怜，让民间组织觉得，不再有主人翁的角色，不是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而是生态链条上的高端和低端的区别。政府购买增多，其中人员的成本占比也是问题。这种对比无疑会刺激行业发声。但真正改变格局的，是非公募基金会对行业发展的判断和基于判断的行动。

南都公益基金会的李玉生撰文认为，2007年以来，非公募基金会的数量以每年

20%的速率增加。目前处于行业发展初期，非公募基金会自身的专业化程度并不高，公益价值链并未有效形成，短期内仍处于资源相对稀缺的阶段，但随着非公募基金会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公益价值链逐步形成，资助方与执行方（草根NGO）彼此的角色认知和分工定位进一步清晰明确，那会发生什么情况？无疑，对好项目（广义：优秀机构、优秀项目、优秀人才）的争夺将加剧。公益行业的买方市场将在不久的将来到来，李玉生判断短则2~3年，长则5~6年，情况就将发生变化。

但是，整个公益领域人才储备不足，新成立的基金会和机构要从这个领域招人已非易事，其他领域的人才进入这个领域，在产业化、专业化的大势下，早年高举的道德和理想旗帜有时还被人嘲笑，一个有竞争力的薪酬才是最务实、最可靠的。因为行业发展的需求，人才培养被逐步提上了日程。于是一些人才培养的项目纷纷设立。去年成立了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还有一些基金会纷纷筹办公益大学。

针对以往资助方注重项目执行轻人力资源的弊端，南都的银杏伙伴计划和阿拉善SEE基金会的生态奖都在人才培养方面投入了资金。2010年5人入选南都公益伙伴，2011年16人获选，同样每年每人10万元、连续三年的支持计划，表明今年南都加大了人才的支持力度。据报载，这次入选伙伴计划的河南恩来公益的创始人方红是“放手一搏”。他做公益10多年，搭进时间、全部积蓄，已到了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低薪问题让很多走进公益圈的人不得不在现实面前低头。

冯永锋两年前和同道发起创办了达尔问自然求知社。现在机构每年执行总额300万左右的项目。更让人羡慕嫉妒的是，达尔问的薪酬标准是3 000、5 000、8 000元乃至更

多，即入职第一年是每月3 000元工资，第二年每月5 000元……在谈薪酬讳莫如深的惯例下，他丝毫不在意说出他们的工资标准。在银杏伙伴计划答辩会的最后，他评论道：“我最近感受很深的，NGO正在成为一个行业，一个行业的标志就是工作人员的职位、待遇将越来越好，这种待遇不是说我们为了钱，不是说我们要得到很好的工资待遇，而是与之关联的很多东西都要非常好。我去每个基金会的时候都很骄傲，对他们说，把钱给我们，因为只有我们这些人才能帮你把钱花好，所以在座的各位不管是18位还是全国的几百位，其实未来要很自豪地到基金会去说，你们赶紧把钱给我，只有我们才能帮你把钱花好。”

其实，他并没有公开说的是，在刚开始投入做达尔问的时候，自己曾投入了几十万元。他觉得，做事业就要甘冒风险。所以他对《中国财富》那期“血汗公益”的选材，认为不当。在呼吁薪酬的时候，理想和付出的公益底色依然存在。

题外：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南都银杏伙伴遴选的标准是“优秀个人、合适的成长阶段、发挥较大的杠杆作用”。接下来的问题，是选拔什么样的人？培养目标是什么？

孟维娜连续两届参加南都银杏伙伴候选人见面会，她认为，候选人的演讲表达比较“大同小异的优秀”，这让她有点着急。因为南都声称培育未来公益事业“领袖”，但目前的名单“重量级别”总体来说较轻，他们有一定的激情，但这些未来领袖很少能意识自己的问题，都是在说机构，说“事”不说“人”，或“说人”都是感恩一类的真话，不说思想交锋的真话。

她认为推荐的既然是“未来领袖”而

不是“现在优秀”，所以应很看重被推荐的人是如何认识自己发展的“瓶颈”以及识别“道”和“术”之间的关系？因为中国公益事业发展到今天，每一个机构领导人的能力已经有很多机会得到锻炼提高，却在“道”的学习方面很有疏忽。

孟维娜所创办的慧灵有一名地区总干事是候选人，在讨论什么是这位总干事成长“瓶颈”的时候，她和这位候选人有一定的分歧，候选人希望自己得到更多的专业成长。而孟维娜则坚持强调入围银杏人才计划，要解决作为慧灵高层怎样面对社会大环境的改变，怎样打破小农意识，怎样面对不同意见和反对自己的意见的问题，讲到底是为提高“道”而进入银杏人才计划百炼成钢，不应存在锦上添花的虚荣。虽然对比其他已经入围的名单，孟维娜是同意这位慧灵总干事入围的。

老一代公益人对未来公益领袖的期待，是否就是年轻人成长的目标？在这个问题上，公益领域出现明显的代际差别。年轻人更强调“效率和效果的专业化程度”，而不是讨论宏大的问题。年轻人特别关注的，怎么让年轻人有更多的资源，“而且老一辈的人也应该有这种视野，就是这个行业是要可持续发展的，要有新的人进来，要培养新的生态。”一位青年环保从业者如是说。

香港中文大学的研究者吴逢时在一次会上回应这个代际的问题时说，我觉得第一代NGO领导人有非常宏观的经验和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在这方面很有智慧，有非常宽阔的胸怀。而新一代的NGO的情况也反映了中国经历的变迁。现在的80后、90后没有经历过政治压迫，所以很难让他们想很多政治问题，但是值得思考的是，怎么让公益前辈的经验分享和传承？这非常重要。

组织公益：

黯然失色在个人公益的光影下

◎ 刘海英

邓飞、于建嵘、王克勤这些个人公益行为，为2011年丑闻迭出的公益领域增添了一抹亮色。有媒体说，他们拯救了今年的公益界，虽然言过其实，但足以证明其声势和影响。

纵览2011年的公益行动，进入社会大众视野的是“微博打拐”、“免费午餐”、“大爱清尘”，这些行动的特点皆是以微博为平台，以个人而非组织的名义发起，不但服务对象受益，还得到了政府和公众的支持，甚至直接和政策出台挂上了钩儿。相形之下，让那些一直被认为是公民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NGOs黯然失色。还在半个世纪之前，就有学者指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中，组织的产生和发展，为我们实现那些仅凭个人力量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提供了重要的机制和保障。”但是在2011年关于公益组织的主流舆论中，这句话成为一个被媒体“证伪”的命题。在公益貌似越来越是主流化的今天，NGO真的没落和边缘化了吗？若此，原因在什么地方？

1月25日，于建嵘开通了微博“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微博打拐”引发了连锁反应。民间组织、义工团体、媒体、明星微博也纷纷行动起来，参与解救孩子的行动。对于这个社会自发行动，多家公安官方微博纷纷发布公告表示支持，希望网友提供线索。

10月26日，国务院决定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今年春天，由邓飞等人发起的“中国贫困山区小学生免费午餐”

活动，已为77所学校1万多孩子提供了免费午餐。从民间走到政府，被评论为“从来没有一例民间公益行动像‘免费午餐’这样成功。”

同样成功的，还有梁树新的“铅笔换学校”等活动。鉴于今年微博公益的火爆，联想集团设立奖项，以“微公益，做不凡”为主题举办微公益大赛，聚集更多的微公益项目和行动。通过搭载和鼓励微博创新平台，吸引更多人关注身边的公益，让公益真正成为人人可以实现、阳光快乐的生活方式。在他们的官方网站上，微公益之星的平台上，已经有18个项目亮相。

这些个人公益行动的成功，媒体，尤其是微博功不可没。有“中国天使投资第一人”之称的薛蛮子，从撰写打拐檄文到开始行动，微博成为他的平台。他眼里的微博就是“放大镜、照妖镜和显微镜”，个人的声音通过众人的互动和转发变成舆论，进而促使整个国家机器开动。

微博变成公众介入公共事务最强大的工具，聚集了大量志同道合的人。而发起公益行动的非专业人士也极大促进了平台的开放，打破了专业人士的小圈子。邓飞说他并不懂慈善，不是专业人士，只是偶然闯到了这个领域，然后汇聚了民间的善意而已。但不懂有不懂的好处，不懂就要公开透明、积聚智慧。

不可否认这些行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除了微博的助力，还得益于他们的职业身份。媒

体人做公益本身有传播的优势，这在中国民间组织发展历程中，不胜枚举。只是在网络和微博发达的今天，对于媒体人更是如虎添翼。相比其他专业人士，媒体人不但掌握话语权，而且拥有各种人脉和资源，更容易识别信息和资源所在，也具备调动和整合资源的能力，更难得的是，他们更容易直面社会的苦难和需求。

“邓飞、王克勤、孙春龙等人都是知名的调查报道记者，在社会上拥有一定的公信力，他们发起公益项目能提升公众的认可度，有很多人就是冲着公信力来支持这个项目的。”^①看看他们调动资源的能力：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微博上，14个公安微博参与打拐，30个公益或者义工团体，52家媒体参加。而“免费午餐”至今已经有100多家媒体对其进行多角度报道。

与职业无关的是对项目的制度设计。“免费午餐”是标准化配置的：一个鸡蛋、一碗饭、一份菜。“中间即使有克扣，也无非是鸡蛋小点，米饭少点，但3样东西不能少。”邓飞这样考虑。此外，还有三个层次的监督：一个是开设项目的学校由非采购人员将每天的用餐情况发到学校的微博上，二是建立学校、家长和学生一起的监督系统，三是回乡或者旅游的网友可以随时走访。当监督和校方发生争执的时候，他呼吁有个第三方的法律仲裁的机构。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领衔此事。

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认为成功的原因，更关键的是它的项目设计本身。身在公益领域也熟悉政府运作的他说：“‘免费午餐’选择了公众普遍关心的贫困儿童作为关注点，这使得社会各阶层都易于达成情感的共鸣，但我们同样看到，以往也有一些

关注儿童的民间公益项目，但都没有取得这样的成功。”民间对现实问题的理性对待而非对抗，让政府切实感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善意。^②

这两点是项目成功的关键，也正是此类项目的局限。

西部阳光教育基金会有个“阳光鸡窝营养早餐计划”，行动之前实地调查2年，并对贫困山区孩子的身高和体重等基本指标进行测定、对照，发现营养不良的问题，对230名儿童每天提供一个鸡蛋和一杯白糖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2006年对试验点学龄儿童补助2.5~4.5元不等。2007年起中国滋根教育基金会“豆浆工程”，对8所小学每天一杯热豆浆，通过改善农村儿童营养状况，保障贫困儿童的基本生存权利和教育权利。

这些公益组织在一个或几个项目点上深扎下去，获得数据、实施行动、政策倡导。和“免费午餐”相比，他们有更扎实的专业团队，但没有网友的广泛参与，也没有惠及万名学生。但能否就评价说，这些项目相比“免费午餐”是失败的呢？

NGO工作领域非常广泛，劳工、性别、公共健康、艾滋病防治、教育、扶贫诸多领域。不是哪个工作都可以在短时间看到效果，不是哪个工作都可以得到类似公安部门这样的支持，不是每个边缘群体的生存和另类的价值都能得到社会广泛的认可，如在儿童教育上形成广泛的共识。善于策划的梁树新说，在选择公益项目的时候也不能不多加考虑：“我会比较关注一些门槛低，能够让大家都参与，而且很快就能看到成果的项目。”^③公益是多层次的，从围观到从网上转发一次就是行动，降

① <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ewsview.php?id=4393>.

② 石念军.免费午餐行动获政府回应 民间探索引领国家行动[N].齐鲁晚报, 2011-11-01.

③ 梁树新.“围脖”赈旱记：微波成抗旱公益行为最新平台 [EB/OL].http://china.nfdaily.cn/content/2010-03/30/content_10579558_2.htm.

低了人们参与的门槛。但是门槛那边，其中复杂、艰险的境地依然是少数人涉足。常年的重复的、细碎繁锁的工作，早就不具有新闻、价值，背后那些不为外人道的，完全可以成为惊心动魄的故事，只是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

这几位个人公益明星，并不从项目经费里领取工资，这些活动本身不是NGO最熟悉的项目制。他们有自己的专业和生活来源，他们可以“不赞成抱着苦行僧的心态做公益，也反对打悲情牌、放催泪弹。”的确有打悲情牌的，但悲情在很多时候并不是刻意出的一张牌。这个行业里，在资源有限而且分布不均的情况下，苦行僧是不可缺少的。如果一定远离苦行僧的生活，不知道支撑这个行业的还有谁？会是谁？

但是，无论如何，微公益行动很大程度促进了公众参与，同时也让民间组织有所尴尬。这种开放、透明、快速积聚资源的行动和反应，有效的传播方式，也催促NGO的反省。多背一公斤的安猪批评：NGO在意识到被政府边缘化的同时，更要意识到自己正在被社会边缘化，而这种边缘化是自我选择的，它来源于自身的傲慢、迟钝和自我陶醉。”正所谓大道不孤，有警醒的公益人自有未来。●殷情切切，恨铁不成钢。除了组织要有提升和成长的自我意识，突破外部的束缚和局限依然任重道远。

组织的发展受制于技术和市场，还有行政力量的压力和限制。10月28日，在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的沙龙上，针对笔者提出的当民众需要NGO的时候，NGO没有敏感性、没有动员力的问题（详见《中国发展简报》2011年夏季刊“重回垃圾议题之尴尬与期待”），梁晓燕做了回应。大概四五年以前，梁晓燕跟时任绿色和平总干事卢思骋有过一次讨论，她认为

中国有环保组织，没有环境运动。社会运动需要有广泛的公众参与。通过PX事件、南京的古树保护事件和许多民众自发性抗争的污染事件，都可以看到在今天的中国一些环境运动的萌芽和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的承担者是谁呢？如果是民间环保组织，在环境运动触发的时候，它应不应该、有没有能力作为一支生力军引领或者介入？

什么样的组织才可以培养运动的萌芽和引领运动？很多NGO先自我矮化，给自己定位是联系政府和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政府的一个重要补充，是政府的朋友、伙伴、参谋、助手等等，这种表述在民间组织中是一种普遍的存在。之所以如此，首先是要活下来，谋得合法性生存。梁晓燕一串联问：这些表述是主动的选择还是被动的自我定位？这个定位是不是一种不得不的选择？这和社会运动的定位，和社会运动所要求的组织的定位是什么内在的关系？是不是有悖论？另外，现有的筹款制度把NGO用项目制框得死死的，民间组织完全被项目绑架。从人力资源、工作计划、工作成果来看呈现，所有这些方面是在一个项目框架中进行的，令它的某一部分能力无法发展起来。

在一种热闹升平的媒体合奏中，我们看到了几个公益人取得的成果和更多人的行动和努力，其间资源聚集的方法、项目操作的层次、传播和游说的能力，值得民间组织学习。期待民间组织在新的一年里，在上述现有的两个束缚很难改变的情况下，依然有突破，自我成长，打破一个个封闭的小圈子、小系统。但另外应该警惕的是，不能将个人公益行动作为一种新的标杆，来测评和否定那些支撑这个行业的不发声和不能发声的人和事，甚至以为这就代表了公益未来全部的方向，这样的思路和做法一定存在偏差。